

從哈佛園到神學街

——哈佛燕京學社遷址憶述

• 李若虹

四處大興土木的年代，老建築的拆建往往觸動人心。和世界各地高校樓房的嬗變和樓址的更遷一樣，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以下簡稱「學社」) 在 1958 年遷址牽動着一段學術史的記憶，也和眼前哈佛大學校園內外新老建築交替的現場相呼應。造訪哈佛園 (Harvard Yard) 時不難注意到，老哈佛園 (Old Yard) 內的博義思同樓 (Boylston Hall，以下簡稱「博樓」) 前、懷特納圖書館 (Widener Library) 西側矗立着一轟負石碑，這是 1936 年哈佛建校三百周年時中國校友會給母校贈送的一份重禮。可是石碑的選址遠離現今哈佛東亞學的教研重地，令人好奇。其實，轟負碑的選址不僅牽涉到博樓和神學街二號 (2 Divinity Avenue) 兩座教學樓先後作為東亞學駐地的興建和裝修史，而且事關二十世紀前半期哈佛學科創建和發展的一段重要歷史。

康橋哈佛園內外，做學生時我去得最勤的就是哈佛園外北邊的神學

街二號和哈佛園裏的博樓。初來乍到，我進的第一座樓就是神學街二號，慕名前往樓內的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1929 至 1965 年間稱「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這樓前有兩尊石獅子，很容易識別。多年裏，先來上課、進圖書館，畢業後就在樓內工作。在做學生的最後一年，更常去哈佛園內的博樓。那時一邊寫論文，一邊做助教，帶中國史通識課的本科生和東亞學專業的大二學生，每星期小組討論會後都要見學生答疑。我圖方便，看中了位於中心地帶的博樓。樓內寬敞，舒適的蒂克諾休息室 (Ticknor Lounge) 裏可以喝咖啡、吃午餐，也可以和同事、學生聊天；過道上還有電腦，可隨時查看郵件。除了見本科生，我還時不時拐入樓內歇腳。往後在學社工作多年後才明白，學社先後坐落於博樓和神學街二號，與這兩幢樓結下至深淵源。

一 博義思同樓

博樓是哈佛園內最古老的建築之一。和波士頓地區以「博義思同」(Boylston)取名的小鎮、街道一樣，顧名思義，這幢樓的興建和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世家望族之一的博義思同家族息息相關。1828年，博義思同(Ward N. Boylston)去世後給哈佛留下一大筆資產。根據他的遺囑，這筆經費要用於修建一座石料建築，其內部需要設有一處演講廳和一間化學實驗室，還得有解剖學博物館和圖書館，用來存放他本人收藏的醫學、解剖學著作和解剖學相關的雕刻版圖。按照博氏的遺囑，哈佛在1858年聘用舒爾茨和舒恩(Schulze and Schoen)建築設計公司，選好哈佛園內東南邊的樓址，開建新樓^①。新建的博樓有兩層，以其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著稱，顯赫於校內其他喬治亞復興風格的建築群，外牆由麻薩諸塞州羅克港(Rockport)產的上等花崗岩石塊砌成。建成後的最初二十年裏，博樓主要用來作解剖學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和校園內外其他教學樓相比，博樓除了其建築風格引人注目之外，還是哈佛園內裝修最為頻繁的一幢教學樓。在大樓建成後的一個世紀裏，歷經多次裝修、擴建和重新規劃。1871年，碧波地和思坦恩斯(Peabody and Stearns)公司承接了擴建專案，給博樓添加了第三層。擴建後，化學系及其實驗室遷入博樓。化學系本來設在哈佛園正中的大學樓(University Hall)，設有美國第一家化學實驗室，但是樓內結構和設施不宜做化學實驗室。雖然化學系遷出大學樓而入

駐博樓乃權宜之計，可一呆就是半個世紀。期間博樓第三層在化學實驗課中曾發生火災，火苗穿透下面幾層の木質地板。1928年馬林克羅特化學實驗室(Mallinckrodt Chemistry Laboratory)在校園外的牛津街建成後，化學系及其實驗室遂撤離博樓。化學系遷出後，位處大學黃金地段的博樓一下子騰出不少空間，於是好幾個部門相繼遷入。隔壁的懷特納圖書館的裝訂部需要額外空間來安置新的裝訂機以裝訂散葉的舊書，就近挪入博樓，便於館員來回活動。另外，歷史系所在的羅賓遜樓(Robinson Hall)空間吃緊，趁機把供本科生使用的藏書挪到博樓內。而博樓正是在這個時候為哈佛最早的一批漢文和日文藏書提供了一處集中存放的場所^②。

哈佛收藏漢文和日文書籍始於二十世紀初。當1879年戈鯤化到哈佛第一次開設中文課時，哈佛幾乎沒有漢文藏書可言。直到1910年，圖書館才開始零星收集了一些漢文書籍。191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服部宇之吉和姊崎正治兩位教授到哈佛哲學系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國時捐贈了1,600冊日文藏書，這為哈佛日文藏書奠定了基礎^③。真正使得漢和藏書有了完全改觀的是在1920年代，源於美國鋁業大王霍爾(Charles M. Hall)為哈佛發展亞洲研究提供的一筆捐贈。

1925年9月，管理霍爾遺產的董事會籌備在中國設立一個研究中心，旨在通過哈佛和燕京大學以及中國其他教會大學之間的合作，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圖書館館長洪業和哈佛商學

院院長董納姆 (Wallace Donham) 等人的協商下，霍爾遺產董事會成員與燕京大學達成了臨時協定，合作建立「哈佛北京中國研究學社」(Harvard-Peking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當時哈佛圖書館第一任館長柯立奇 (Archibald C. Coolidge) 希望燕京大學圖書館能為哈佛圖書館代購漢文書籍，這一想法得到了洪業的支持。雙方達成臨時協議，霍爾遺產董事會決定委託司徒雷登物色中國一位大學圖書館館長採購書籍，而且雙方就購書計劃、選書原則、裝運設想、交易細則進行了商討。這是兩所大學合作購書的開始，即由燕京大學圖書館為哈佛圖書館代購漢文書籍^④。

自1909年開始，柯立奇在哈佛第一次開設一門遠東歷史課，並逐漸積累了一些東亞書籍，但那時哈佛圖書館的漢和藏書存放在懷特納圖書館內，散落在不同樓層多處^⑤。苦於沒有專人負責管理藏書，柯立奇慧眼結識裘開明，聘請他進行哈佛漢和藏書的整理和編目。裘開明當時正在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留洋前曾是廈門大學圖書館館長，深諳漢文古籍善本。

1928年1月，在霍爾遺產董事會的資助下，學社在麻薩諸塞州正式註冊創辦，入駐哈佛。學社創辦之初的宗旨，即「通過創辦、發展、支持和維持教學機構的活動和與文理研究生院相關的研究和教學活動，重在從事與中國文化和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其他地區的文化相關的研究、教學和出版活動」。在創辦的最初二十年裏，學社有兩處駐地辦公，一處在哈佛，另一處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具體的學術活動則集中在哈佛和在華的美國教會大學，旨在發展漢學研究。化學

系從博樓搬出之後，為這一新成立的學社提供了辦公位址，也為哈佛最早的漢和藏書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存放空間，最早收藏的一批4,000多冊漢文藏書和1,000多冊日文藏書，被稱為「漢和文庫」^⑥。

漢和藏書集中存放博樓成為發展東亞教研的一個好開端。根據《哈佛圖書館簡報》(*Harvard Library Bulletin*)的記載，1929年博樓經過全面裝修後，為漢和藏書提供了一處安家之地^⑦。裘開明自然而然就接管了漢和文庫，繼而負責管理剛剛遷入博樓的漢和藏書，開始了他在哈佛長達四十年的圖書館工作生涯。而這也促成了哈佛園和遠東研究的機緣，標誌着學社及其藏書一起入駐哈佛的漫長歷史的開端。當時擔任文理研究生院院長的蔡司 (George H. Chase) 同時也擔任學社董事，他在董事會上報告說：「漢文和日文書籍移入博義思同樓後的漢和圖書館有諸多裨益，成了哈佛的中國學生會聚的場所。」學者以書為友，以書交友。自此之後，這裏不僅是哈佛東亞學藏書之地，而且也是哈佛東亞研究師生交友、做學問的好去處。1929年夏，哈佛漢和文庫正式改名為「哈佛燕京學社漢和圖書館」，由學社負責管理^⑧。

二 神學街二號

正當學社及其圖書館在博樓安頓下來之際，哈佛新創辦的地理考察研究所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在老校園外的「蠻荒北郊」(現在的神學街一帶) 開工動土，奠基建樓。



哈佛燕京圖書館古本藏書（圖片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

說到地理考察研究所的興建，不得不提賴斯 (Alexander H. Rice)。賴斯出身富家，本科畢業於哈佛，是一位外科醫生，但是業餘熱衷到南美探險。賴斯能在母校建樓、創辦地理考察研究所，離不開他太太埃莉諾·懷特納 (Eleanor E. Widener) 的關係網。埃莉諾是當時波士頓上層社會的一位社交紅人，前夫和兒子不幸喪生於泰坦尼克號郵輪 (Titanic) 沉沒事故，埃莉諾為紀念丈夫和兒子，向哈佛捐資修建懷特納圖書館，這事廣為人知；但人所不知的是她和神學街二號的創建也息息相關。1915年，埃莉諾再婚賴斯。夫婦一度計劃給美國地理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捐款，以賴斯擔任學會主席為交換條件，但遭到地理學會的嚴辭拒絕。從此，時任地理學會主席鮑曼 (Isaiah Bowman) 和賴斯夫婦結下私怨^⑧。

賴斯夫婦轉而和哈佛聯繫，校長洛厄爾 (A. Lawrence Lowell) 接受賴斯的捐贈，同意為他捐贈成立的研究所建樓，並授予賴斯教授頭銜。埃莉

諾來自費城，當年構建懷特納圖書館時聘用了居於費城的建築師特朗博爾 (Horace Trumbauer)，現建新樓同樣聘任他為建築師。大樓於1929年奠基，1930年建成，也就是現在的神學街二號。這幢新樓採用了喬治亞復興風格的設計，而由於賴斯熱衷南美探險，樓面鏤有南美動物和南半球地圖浮雕，至今保留完好^⑨。

賴斯夫婦最終如願以償——地理考察研究所在1931年成立，賴斯既是第一任所長，又享有教授頭銜。鉅額捐贈看似為賴斯帶來了功成名就，但是哈佛地理學圈內的學者一致認為，賴斯並非學者，出任教授和研究所所長實為名不正言不順。行內學者稱賴斯為「壞傢伙」(scoundrel)，認為他身在哈佛實為「麻煩」(nuisance)^⑩。地理考察研究所成立後，地理系尤其是地質科學部的教授都不願與賴斯來往，並遠離該研究所。

雖屬同一學科，地理系和地理考察研究所形同陌路。但到了1940年代末，兩者同遭厄運。二十世紀初

期，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在哈佛的發展可謂一波三折，而在1940年代後期經歷了一場有關學科存亡的軒然大波，當時地理系下屬的地質科學部和地理學部教授和校方爭相討論該不該繼續發展人文地理學、該不該設地理學等學科的大問題。而這場風波的導火線是評審人文地理學者阿克曼(Edward Ackerman)晉升終身教授一事。當時地理系有布萊恩(Kirk Bryan)和惠特爾西(Derwent Whittlesey)等學者從事人文地理學，這一領域雖不算強大，但頗有發展潛力^⑫。系裏助理教授阿克曼被公認為人文地理學界一位傑出的年輕學者，前途無量，但是他晉升終身教授一事卻引發了學科內各方矛盾，不僅最終他未得晉升，而且事與願違，導致人文地理學無法在哈佛進一步發展。

對其中的緣由、糾葛以及地理學科發展的歷史和走向，地理學者史密斯(Neil Smith)曾經引用多方檔案，對此事的前後經過做過詳盡而又深入的研究與分析。據史密斯所述，一些學者的個人恩怨和學術政治糾纏其中，包括早年賴斯和鮑曼的個人恩怨^⑬。可以說，賴斯和鮑曼兩位既是哈佛地理系一度興盛的領軍人物，又是致使地理系慘遭閉門的當事人。因此，當人們在討論哈佛該不該繼續支援地理系時，地理考察研究所自然而然被推到風頭浪尖，為大學取締地理系推波助瀾。雖然鮑曼維護地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在學界的正當地位，卻對哈佛地理系的發展懷有異議，對系內教研持否定態度。當時的哈佛校長柯南(James B. Conant)係科班化學家，出於自然科學背景，本來就對人文地理學科不懷好感。最終，柯南和文理

學院院長邦迪(McGeorge Bundy)一致認為，人文地理學非但不該在哈佛有立足之地，而且算不上一門名正言順的學科。於是地理系從文理學院的學科版圖上消失，地理考察研究所隨之名存實亡^⑭。1951年，也就在地理系取消後三年，地理考察研究所也被取消，賴斯旋即退出了哈佛學術圈。神學街二號人去樓空，留歸大學備用。

三 哈佛燕京學社之喬遷

博樓建成後的百年裏經歷數次裝修、改建，其用途也一變再變，只是灰白色的花崗岩外觀始終依舊。1949年初樓內歷史系藏書和本科生用書被挪到懷特納圖書館和新建的拉蒙特圖書館(Lamont Library)，博樓經過裝修後，使得學社有了更大的行政運作和學術活動空間，佔用整個一樓的面積，足以為遠東語言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遠東區域研究專案行政辦公室與學社漢和圖書館提供空間，還為不斷增加的漢和藏書資料提供足夠的存放位置^⑮。

從1928年開始到1950年代初，學社入駐博樓二十多年，博樓逐漸成為哈佛發展東亞教研的重地。1930至40年代，周一良、楊聯陞等學者受學社資助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時，幾乎都是在博樓內度過學生時光。他們在日記和回憶錄裏對自己進出博樓的漢和圖書館都有過詳盡的記載。周一良回憶到：「在哈佛，我的學生生活極為單調，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主要工作地點就兩處：一是博義思同樓中

哈燕社的漢和圖書館，那裏中日文藏書之富可以比之美國會圖書館；一是魏德納〔懷德納〕圖書館亦即哈佛的總圖書館，研究生可佔一張用格子隔開的小桌，自由取閱庫中書籍，還可留置桌上長期使用，方便異常。」^⑩而楊聯陞在日記裏屢屢記下自己在漢和圖書館內遍覽群書，搜尋典籍、史料，考據引證，並屢遇學友的時光。當年學者尤勤於筆耕，即便是聖誕、新年假期或是周末，楊聯陞到漢和圖書館借書，竟曾發現學社首任社長葉理綏 (Serge Elisséeff)、哈佛蒙古史專家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和洪業都在各自辦公室用功。1944 至 1945 年胡適在哈佛任教期間來此自不待言，後來也曾屢次特意走訪博樓^⑪。

如前所述，哈佛三百周年校慶時，中國校友會捐贈了鼉肩石碑。石碑就立在當時作為東亞研究據點的博樓外，緊挨懷特納圖書館大樓西側。那些年裏，博樓在哈佛的知名度漸增。《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 在 1944 年還做了專題報導，稱博樓成為東亞研究學生的「麥加」。報導中還特別介紹，學社主辦的國際學術活動，「在中國北平以燕京大學為據點，而在哈佛園內則立足於博樓」^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東亞學的不斷發展，學社及其圖書館面臨着一系列問題。首先是空間的緊缺。漢和藏書劇增，尤其是源源不斷地從中國運來的大量書籍。比如，柯立夫在學社獎學金資助下獲得博士學位後，於 1944 年服役於美國海軍而被派往中國北方，期間他還擔任了鋼和泰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為學社於北京創辦的漢印研究所 (Sino-

Indian Institute) 代理主任，為漢和圖書館收集了不少善本，其中最大的收穫就是日軍戰敗退出天津時，柯立夫成功說服僑居天津的日本人為漢和圖書館捐書，得到 5,000 多冊日文書籍，在學社資助下運至哈佛。在北平期間，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滿文和蒙文的珍本典籍，包括拉薩版的《大藏經》和滿文與蒙文史料，現存哈佛燕京圖書館^⑬。戰後哈佛有關遠東歷史和政治的所有課程所需的書籍都一律存放在博樓內，與漢文、日文和韓文書籍存放在一起，便於師生使用^⑭。1951 年秋天學社的董事會上，社長葉理綏傳達了漢和圖書館館長裘開明提出的書庫空間緊缺問題——圖書館的一半藏書將不得不挪到拉蒙特圖書館。1952 年春天的董事會上，葉理綏再次提出圖書館書架不夠的問題：「1941 年大學曾在博義思同樓添加了兩層書架，當時鋼材緊缺，沒能裝第三層，現在到了該讓學校裝上第三層書架的時候了！」

其次是博樓內的空間、設施和條件不適合長期存放善本。漢和圖書館內缺乏對溫度和濕度的妥善控制，有礙善本書的保存，而且樓內曾因大雨來臨發生水浸，善本藏書室地面積水，藏書嚴重受損，況且依然有火宅之險。1954 年秋天學社董事會上第一次提出學社和圖書館需要遷出博樓的想法。

再者，二戰後美國高校正經歷着學科變化、調整和發展的動盪時期，為東亞學提供了發展的契機，哈佛自不例外。在學社支援下，東亞學得到長足發展，開設新專案和新課程。從 1954 年開始，學社設立訪問學者專案，每年邀請東亞學者駐訪於

學社，從事一兩年獨立的學術研究。1956年起，學社和遠東語言系由賴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 執掌，東亞語言教學和東亞研究得到穩步發展。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與賴世和認識到東亞對美國的現實意義，從1946年開始為本科生開設中日歷史大課，俗稱為「水稻田課」(Rice Paddies Course)，修課學生竟一度有120人之多。學社和遠東語言系對教研空間的需求隨之一年比一年緊迫，博樓一樓和地下一層愈來愈擁擠，樓內的基本設施亦出現日久失修等問題。隨着藏書量不斷增加和樓內設施問題頻出，學社董事會不得不考慮學社及其圖書館此後該何去何從。

當時文理學院正計劃把一些系科或研究所遷入神學街二號，使得騰空已久的空間能派上用場。為了妥善保存漢和圖書館的藏書，並為師生的活動提供更大的空間，文理學院院長、學社董事會成員之一的邦迪提議，將學社及其圖書館遷入位於花園街 (Garden Street)、樓內設有防火系統的格瑞植物標本樓 (Gray Herbarium)，但是葉理綏認為花園街離哈佛園較遠，否決了這一提議。在1954年秋天學社的董事會上，邦迪正式提出了學社遷入神學街二號的設想。之前葉理綏開春時曾走訪神學街二號，但認為樓內空間不夠，如接受搬遷，非擴建不可。雖然搬遷計劃並沒有馬上落實，但是董事會決定先給博樓裝上防火警報設施。

1955年秋天，董事會接着對學社遷入神學街二號做了詳細的討論。雖然校方並非建議立馬動用神學街二號，但是一致認為該樓裝有防火設施，更適合用作圖書館。董事會還強

調，將來漢和圖書館對入駐學社的訪問學者和研究生會愈來愈重要，因此決定將學社及其圖書館遷往神學街二號。到了1956年11月13日，董事會把原來尚處討論階段的搬遷計劃視為當務之急，因為博樓接連發生意外，先是失火，再是藏書室進水，學社對圖書館藏書尤其是善本堪為擔憂。至此，學社外遷已成定局。不久，董事會即決定學社及其圖書館搬入神學街二號之前，對神學街二號進行裝修和擴建²⁰。

經學社董事會討論和協商，神學街二號的裝修、擴建工程於1957年由謝普利、布爾芬、理查森和艾博特 (Shepley, Bulfinch, Richardson and Abbott) 設計公司承建。樓內的一樓和地下一層進行裝修，神學街二號往後擴建，擴張的側翼一共四層——三層為圖書館所用，增加了大片的藏書空間，第四層為創建不久的統計系暫用。在往東邊擴張的部分，建了一個能容納275個座位的大演講廳，即燕京演講廳 (Yenching Auditorium)。從建築風格來看，擴建的部分在規模和建築材料的使用方面都做過精心考慮，盡量做到既和原有建築相吻合，又和鄰近的閃米特克博物館 (Semitic Museum) 相配合，彌補了神學街上毗鄰的兩座樓風格相左的缺憾²¹。

1958年夏天，神學街二號裝修、擴建妥當後，學社及其圖書館順利搬入²²。從此，駐學社教授各自擁有獨立的辦公室，圖書館有了充足的書架空間和閱覽場地；樓內還有一間地理考察研究所留下的地圖室。遷入不久的統計系和學社及其圖書館共用該樓，一直到1972年。隨着漢和圖書館於1965年更名哈佛燕京圖書

館，遠東語言系於1972年更名東亞語言及文化系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以下簡稱「東亞系」)，圖書館藏書和使用量不斷增加，統計系遷出後騰空的四樓全部歸圖書館使用，即圖書館今天的善本部所在。遷入新址後，學社及其圖書館與東亞系有了更大的教研空間。1962年，波士頓藝術家斯塔爾 (Polly T. Starr) 為紀念父母，給學社捐贈了一對來自北京的大理石獅子，不僅為神學街二號錦上添花，而且這對石獅子從此成為這座樓作為東亞研究重鎮的地標²⁴。

時移事遷，深諳東亞學的師生、學者紛至遝來神學街二號，門前的兩尊石獅子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想當然把該樓的構建和東亞學合為一談，而大樓正門上面標誌南半球和南美歷史遺迹的浮雕遠不及門前一對石獅子注目。長時期內，除了熟知哈佛地理系二十世紀中期往事的上一輩學者之外，幾乎沒人關注賴斯留下的標誌南美地理的浮雕，更無人知曉這座樓創建前後近似醜聞的往事。地理考察研究所曾在1930和40年代一度風生水起，可那段歷史僅僅留存在少數人的記憶中，深深埋藏在檔案館內。直至1998年，賴斯當年的學生沃什伯恩 (Bradford H. Washburn) 才把賴斯的記憶帶回神學街二號。沃什伯恩畢業於哈佛後曾擔任賴斯的副手 (後來擔任波士頓科學博物館館長)。半個世紀後，他重返故地，為紀念導師專門設立了一格名匾，鑲嵌在入門廳堂的右牆上，刻有神學街二號最早的創建人賴斯的姓名、生卒年份和貢獻，道出這幢樓的來龍去脈²⁵。

四 結語

1957年擴建神學街二號之時，董事會曾樂觀預言，新的空間至少能用上十五、二十年。一個甲子過去了，那時的願景早已成過去。今天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日益增加，以至於近半藏書 (和大學總圖書館一樣) 不得不存放遠郊庫房，而且師生的教研空間亦日益緊缺。最近十年到二十年裏，東亞學以至亞洲學領域內的師生期望得助於校方，再度擴建神學街二號。雖然這個願景的實現仍然遙遙無期，但是毫無疑問，東亞系搬到神學街二號後得到的長足發展有目共睹。

相比之下，哈佛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領域所遭遇的厄運終究未得逆轉。哈佛在1948年取消地理系帶來的損傷還在於其久遠影響——無形中決定了國際地理學界往後多年的發展走向，北美不少高校的地理系被取締。往後二十年裏，甚至到了1980年代，不時還有哈佛學者、學生要求恢復地理系，但是或因缺乏經費，或因學科依舊難得校方的重視，或因人事糾葛，呼聲也罷，建議也罷，恢復地理系一事終究不了了之。自從1940年代末，地理學在哈佛落入荒涼地帶，再無起色。

而學社及其圖書館一遷出，博樓立馬開始又一次大規模的裝修。哈佛一度計劃徹底清拆博樓並重建²⁶，但是根據博氏家族的遺囑，校方需要保留原有的花崗岩外觀才得以繼續使用這一家族的捐贈，於是博樓作為歷史遺迹的外殼得以保留，樓內的演講廳還在，但是化學實驗室、解剖學博物館和圖書館早已挪到校園北邊的博物館區，博樓今天成為集教學

和辦公功能於一體的教學樓。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裝修、改建和調整，博樓毗鄰懷特納圖書館、沃爾沃斯樓 (Wigglesworth Hall) 和葛雷樓 (Grays Hall)，樓內有羅曼語族語言和文學系、語言系、古典研究系與婦女和性別研究專業，遠東語言系的影子早已蕩然無存，從1928到1957年學社及其圖書館在此安身的歷史也鮮為人知。只是樓外的聳肩石碑從1936年至今一直矗立於博樓的東北角，偶爾勾起人們對學社與博樓和東亞學發展史的一段往事的追憶。

哈佛園內外博樓和康橋神學街二號看似互不相關，實則維繫着久遠的學科發展史。兩座樓一個世紀的變遷，展示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哈佛建築和學科互動的一幅圖景，斑駁陸離，引證了建築師的精闢之言，如法國建築師諾維爾 (Jean Nouvel) 說到：「新境況需要新的建築」，而德裔美籍建築學家凡德羅 (Mies van der Rohe) 也曾說過：「建築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時代的意向在空間上的展示。」^② 教學樓的構建、修葺、擴充和學科的創辦、發展、興盛相輔相成，牽涉到「象牙塔」內外多方因素的互動，期間千絲萬縷的細節編織着一系列有關學科盛衰、學者互動、人事糾葛和行政運作的故事，既有扣人心弦的情節，又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更有無可奈何的結局。

註釋

① 舒爾茨 (Paul Schulze) 是十九世紀一位傑出的建築師，為哈佛大學設計了埃普敦教堂 (即現在的紀念教堂 [Memorial Church]) 和博義

忠同樓。1857年，舒爾茨移居紐約，並和舒恩 (Paul Schoen) 聯手創辦了建築公司。

② “Boylston Hall”, <https://rl.fas.harvard.edu/pages/boylston-hall>; Philip J. McNiff, “The Boylston Hall Library”, *Harvard Library Bulletin* 4, no. 3 (1950): 411-12.

③ Kuniko Y. McVey, “By Accident and Design: Some Provenance Stories behind Interesting and Curious Japanese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Beyond the Book: Unique and Rare Primary Sourc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cted in North Ame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15). 這篇文章被收入即將出版的Jidong Yang, ed., *Beyond the Book: Unique and Rare Primary Sources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cted in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④ 以下關於哈佛燕京學社的決議，均出自霍爾遺產董事會及學社董事會的會議記錄等資料，不再另註。

⑤ Robert F. Byrnes, “Archibald Cary Coolidge: A Founder of Rus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lavic Review* 37, no. 4 (1978): 659-60.

⑥ “Boylston Laboratory to be Utilized as Supplementary Annex for Widener Library Bindery Will Go in Basement”, *The Harvard Crimson*, 3 October 1928, 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28/10/3/boylston-laboratory-to-be-utilized-as/.

⑦ “Rearrangements in Boylston”, *Harvard Library Bulletin* 3, no. 3 (1949): 447-48

⑧ 王蕾：〈燕京大學圖書館哈佛購書處歷史研究〉，《國家圖書館學刊》，2013年第6期，頁104。

⑨ 葉超等：〈地理學是一門脆弱的學科嗎？——哈佛大學撤銷地理系

事件及其反思》，《地理科學進展》，2019年第3期，頁315-16。

⑩⑪ Bainbridge Bunting, *Harvard: 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7-68; 168.

⑫ Neil Smith, “‘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 at Harvard, 1947-1951”,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 no. 2 (1987): 156, 167.

⑬ William M. Davis and Reginald A. Daly, “Geology and Geography, 1858-1928”,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since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Eliot, 1869-1929*, ed. Samuel E. Mori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28.

⑭ Neil Smith, “‘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 155-72; *American Empire: 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438-44.

⑮ 葉超等：〈地理學是一門脆弱的學科嗎？〉，頁314-15。史密斯特意提到，哈佛地理系取消之後，耶魯大學雖接着創建了地理系，但是十年之後遭受同樣的厄運，而地理系在其他高校也沒有得到正常的發展，從而使得這一學科一直萎靡不振。地理系是哈佛空缺的學科，至今唯一與之相連的是地質和星球研究系，純屬自然科學，而人文地理一直被棄之門外。參見Neil Smith, “‘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170。

⑯ “Rearrangements in Boylston”，447-48; Philip J. McNiff, “The Boylston Hall Library”，413.

⑰ 周一良：《周一良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18。

⑱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1950-1962》，第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445-46。

⑲ “Chinese Institute in Boylston Hall Is Mecca for Students of Orient”，*The Harvard Crimson*, 15 September 1944, 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44/9/15/chinese-institute-in-boylston-hall-is.

⑳ 參見王冶秋：《琉璃廠史話》（北京：三聯書店，1963），頁46-48。謝興堯在《書林逸話》也寫到：「至其銷路，時購買力最強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書店，皆購寄美國，年各約數十萬元。……又近三四年來，燕京大學及哈佛〔燕京〕社因時會關係，挾其經濟力，頗買得不少佳本。」參見謝興堯：《書林逸話》，載《堪隱齋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30-31。

㉑ Philip J. McNiff, “The Boylston Hall Library”，413.

㉒ 從1957到1959年間，哈佛燕京學社董事會的會議記錄保存了有關學社搬遷和裝修、擴建神學街二號的詳細記錄。

㉓ 1958年11月24日的董事會就在神學街二號的會議室舉行，這是學社在該樓內舉行的第一次董事會。

㉔ 第一次提及捐贈石獅子儀式是在1962年11月19日學社的董事會上。至於這兩尊石獅子的來歷和捐贈過程，參見“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64”，Polly Thayer (Starr) Papers, 1846-2008, bulk 1921-2008,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e。

㉕ “A Nod to Ham Rice”，*Harvard Magazine*, March-April 1999, www.harvardmagazine.com/sites/default/files/html/1999/03/jhj.ham.html.

㉖ 建築師奧爾遜 (Rob Olson) 描述裝修多次後的博義思同樓時說：「當今的教學辦公樓套上了一套古迹的外殼。」參見“Boylston Hall”。

㉗ “Quotes about Architecture”，www.quotemaster.org/Architecture.

李若虹 哈佛燕京學社副社長，哈佛大學內亞和中國關係史博士。